

专 论

从“他者”到“自主”：重构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的史料体系、话语体系与理论体系

张继焦^{1, 2}, 吴玥¹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社会与民族学院, 北京 102488;
2.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北京 100081)

[关键词] 东南亚; 华侨华人; 史料体系; 话语体系; 理论体系

[摘要] 论文分析了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在西方视角下的偏向性, 以及从东南亚华侨华人自身视角下的完整性、多样性。长期以来, 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以西方开埠为时间原点、以殖民开发为历史主线的叙事惯性的影响。这种基于西方中心视角的认知框架, 倾向于将华侨华人的历史活动限定在殖民经济的逻辑链条之中, 将东南亚华侨华人复杂的社会实践简化为单一的经济功能或文化符号, 进而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华侨华人作为历史行动者的主体性与能动性。论文提出了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体系的“三个”重构: 走出被掩盖、被误解的历史, 重构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的史料体系; 打破西方中心论垄断与霸权, 重构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的话语体系; 立足于东南亚华侨华人自身, 重构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的理论体系。

[中图分类号] D634.3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162(2026)01-0001-11

From “Otherness” to “Selfness”: Reconstructing Theoretical Frameworks and Historiography of Ethnic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ZHANG Ji-jiao^{1, 2}, WU Yue¹

(1.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Ethnology,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2.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China)

Key words: Southeast Asia; ethnic Chinese; systemic historical material; discours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bstract: The paper gives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Western scholarship on the history of ethnic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For long their works have been predominant, centering around a narrative about the expansion of Western power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lonial economy. The authors argue that such a Eurocentric approach has simplified the sophisticated process of ethnic Chinese participation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Southeast Asia, and thus has undermined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Chinese role as a historical agency taking part in the progress of this region. They urge reconstructing analytical

[收稿日期] 2025-06-09; [修回日期] 2026-01-22

[作者简介] 张继焦(1966—), 男,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社会室主任、二级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学、人类学; 吴玥(1997—), 女, 山东菏泽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海南与东南亚。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冷门绝学专项“海南民间遗存珍稀族谱文本的收集、整理与海上丝绸之路人口迁徙路线研究”(批准号: 23VJXG021)之阶段性成果。

frameworks to study ethnic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by abandoning the hegemony of Western-centrism and formulating an innovative discourse based on investigations of Chinese historical material with the perspective that ethnic Chinese are as one indigenous people of Southeast Asia.

一、问题的提出

国内外有关华侨华人的研究已有百余年的学术史。尤其是自 1978 年中国改革开放后迎来了华侨华人研究的繁荣局面，这与中国快速发展引发的中国研究热密切相关。其中，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海外移民的主要目的地，该地区华侨华人人数之众、分布之广、聚居程度之高皆非其他海外华人社区可比拟。据研究，东南亚地区现有华侨华人 3600 多万，约占东南亚总人口的 6%；^[1] 占全球 6000 多万华侨华人的 60%。鉴于此，东南亚华侨华人始终在华侨华人研究中占据重要位置。回顾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的学术历程，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前半叶的研究多由殖民官员、传教士与贸易机构推动，侧重于对华人社群的人口统计、商贸结构、秘密会社、苦力贸易等的描述与记录；许多早期文献也是由殖民官员撰写。1940 年，姚楠、张礼千、郁达夫、刘士木、关楚璞与许云樵等一批学者在新加坡成立了南洋学会（The South Seas Society），他们通过中国古籍来论述中国移民南下的悠久历史及其对当地的贡献，研究路径带有鲜明的考证学派色彩。^① 然而，由于华侨华人身份跨越国界的复杂性，早期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始终面临视角的选择问题，并形成了两种主要范式：一是以中国为坐标来界定“南洋”华人叙事，倾向于将南洋华人视为中国历史的延伸，华侨华人的勤劳奋斗精神、爱国爱乡爱家和民族主义成为不同时期的研究基调；二是以西方为中心的“东南亚”视角，将华人移民建构为晚清以来不同时期背井离乡、南下谋生的外来移民，或是欧洲殖民者到来后被拐贩到东南亚的底层劳工。

20 世纪后半叶以来，以上两种范式均不断受到挑战。二战后东南亚出现的民族独立与国族建构使学界意识到，无论将东南亚华人视为海外中国臣民，还是殖民体系下的边缘他者，都不足以解释其日益复杂的生存现实。于是，以王赓武等一批在东南亚出生、受西方社会科学训练的学者为代表，南洋华人研究被系统推进；研究重心也从“华侨”转向“华人”，从“落叶归根”转向“落地生根”，并借助档案、商会文献与报刊等材料考察华侨华人的定居过程、商业活动、帮会与社会结构等。理论取向随之由文化延续论、同化/融合论逐步转向认同与本地化。例如，王赓武既批判中国中心论，提出以“侨居”（sojourning）概念理解迁移并强调身份称谓与认同的变化；^[2] 也批判殖民文献以威胁框架理解华人，指出欧洲中心的国家—公民范式在东南亚制造了“永远外来者”。^[3] 此外，陈育崧（Tan Yeok Seong）^[4]、廖建裕（Leo Suryadinata）^[5]、洪宜安（Ien Ang）^[6] 等东南亚学者，梁志明^[7]、李国梁^[8]、曾少聪^[9] 等中国学者都提出了明确批判或理论反思。在批判上述范式的基础上，学界逐渐转向了更为流动的视角，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一度成为新的分析框架，^[10] 研究主题扩展到身份、族群政治、流动资本、全球华人网络等。例如，李明欢提出“逐梦留根”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在中国人跨国流动进程中形成的新常态。^[11]

尽管学界针对旧范式的批判已显有成效，但由于殖民现代性与民族国家话语的长期规训，笔者认为西方中心主义并未真正退场，西方知识霸权依然渗透在史料运用与理论阐释中。尤其警惕的是，这套伴随殖民扩张确立的学术体系，不仅塑造了东南亚的历史叙事，更潜移默化地同化了中国及本土学者的认知。后果是源于中国、根植南洋的华侨华人群体，在学术话语中反而被西方视角所“他者化”。不可否认的是，近代西方力量的到来的确通过建立港口城市、开辟商埠等方式对东南亚的基

^① 例如，许云樵使用《郑和航海图》《武备志》等中国史料，详细比对南洋地名，提出华人官方力量很早就涉足东南亚；张礼千、姚楠合著的《槟榔屿志》（1943 年），详细记录了槟城作为英国海峡殖民地最早开发的历史，其中大量篇幅涉及华人宗祠、会馆和领袖等。

基础设施建设、商品经济发展和全球贸易体系参与产生了深远影响，“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12]。但这真的是全部的历史事实与历史真相吗？众所周知，中国人移居南洋历史悠久，自海外贸易开始就有因“住蕃”而留居当地的中国海商水手。如果从有史料记载的唐代中国移民定居于“群岛东南亚”的9世纪算起，到现在也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13]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解释这段西方殖民者到来之前的历史，又将如何看待当前所谓主流的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范式呢？

二、作为“他者”的华人：西方视角的偏向性

16世纪以来，随着地理大发现与海外殖民活动的兴起，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先后在东南亚诸地建立殖民地，以暴力为手段、以通商为目的在东南亚展开经济掠夺，输出“硬暴力”。同时，以英国为代表的殖民统治也通过教育、制度、法律和历史书写等实施了系统化的“软暴力”输出并将其支配合理化为一种文明的必然。这种西方视角的偏向性经由西方史料、理论等所精心建构的权力结构与话语体系而展开。

（一）西方开埠：论述的起点

殖民主义不仅是武力征服，也会进行知识建构。传统的殖民史学范式往往通过特定的历史分期，将西方开埠确立为区域文明演进的关键节点，从而在东南亚历史进程中构建起“前现代”与“现代”的二元认知框架，东南亚也就被描绘成一个因西方介入才得以发展现代性的地区。迄今为止，在东南亚史研究中，仍经常可见“1786年英国莱特（Francis Light）开埠槟榔屿”“17世纪初荷兰建设巴城”“1819年英国莱佛士（Thomas Raffles）开埠现代新加坡”等字眼，并将此视为能够确认的东南亚诸国历史纪元的分水岭。此后，以西方开埠为论述起点的叙事模式在学界与日常生活中被不断复制，形成了一套自我生产与再生产的殖民知识体系，如莱佛士在爪哇史中构建的“古代黄金时代—伊斯兰衰退—欧洲复兴”历史发展过程。^[14]在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时间框架下，长期生活于此的东南亚华侨华人的历史也成为西方历史中“前现代性”的认知范畴。

在学术生产层面，华人移民史被锚定于西方殖民时刻，人口流动被解释为殖民政策的结果，前殖民时期的华人被简化为“零散商贩”乃至贬斥为“非政治的经济动物”，由此在殖民政府的分类下华侨华人被定位为“东方外国人”（Foreign Easterners）。^[15]例如，荷兰历史学家包乐史（Leonard Blussé）认为，是欧洲殖民者的入侵才导致了17世纪末大量中国人涌入东南亚；^[16]英国殖民官员布里兹（Wilfred Blythe）也提出，直到英国渗透到马来亚之后，中国人才大量涌入并在国家生活中成为重要因素。^[17]《剑桥东南亚史》同样采纳了这一视角，认为正是西方人在东南亚开办茶园、矿山等近代企业的需求，才促成了华人定居点在内陆及沿海城镇的迅速兴起。^[18]乃至在当前中国的相关学术成果中，我们仍经常能读到诸如“随着西方列强对东南亚的开发，亟需大量劳动力，从而引发了近代华人移民高潮”等论述。这些表述虽然客观反映了近代史实的一个侧面，但若将其作为唯一的历史解释，则不免会将华人历史的主体性隐没在西方殖民扩张的宏大叙事阴影之下。在民众的集体记忆层面，南洋宗祠的碑文叙事与大众普及读物也逐渐成为了殖民史观隐蔽的再生产场域，即原本外来的殖民历史框架，经过长期的教育与传播却逐渐成为华人社会自我认知的“常识”。例如，南洋宗祠碑文中反复出现的“西方开埠—华工南下”叙事：“自16世纪西方殖民主义者陆续占领东南亚各国以夺取香料市场开始，就开启了新江人出洋的序幕。”^①在这种论述下，即便是作为华人治理象征的宗亲与会馆组织，在追溯自身历史渊源时也不自觉地采用了西方殖民者的时间坐标，将华人移民的动机与过程单向归因于西方殖民经济的需求。

殖民史观从宗祠碑文到公共教育渗入社会记忆，构成与硬暴力相伴的文化软暴力。笔者认为，

^① 2024年6月，笔者一行人在马来西亚槟城乔治市大统巷的龙山堂邱公司（Penang Leong San Tong Khoo Kongsi）进行调研，引言摘自其内的博物馆。

应辩证看待“西方开埠”叙事，它可作为东南亚近代政治史的某种开端，却绝非华侨华人历史的起点。若不加反思地沿用该框架，既会把东南亚塑造成依赖外力“冲击—反应”的被动客体，也会将华人长期固定为边缘他者，忽视他们在西方人到来之前及之外的历史。无论是传统中国史籍文献记载的自西汉时期就有的海外移民，还是地理大发现后西方殖民者与探险家的只言片语，抑或是东南亚本土的华人拓殖痕迹和民间史料，都指向一个更加多元与复杂的历史图景：早在殖民势力到来前，华人已参与并推动东南亚区域发展；殖民时期又依托商贸网络与组织共同体，在经济上充当关键中介，并在文化层面维系跨国认同。

（二）经营南洋：边缘的华人

16世纪后，欧洲不断在东南亚进行殖民扩张推进，至19世纪末，除暹罗外，东南亚大部已被纳入西方主导的殖民管治。^[19]此时，在西方立场下将“西方开埠”确立为可确认的历史起点后，旧日的南洋、今日的东南亚被正式纳入西方文明演进的时间线。殖民当局随即面临的要务之一，是对马来人、华人、印度人等族群进行系统观察与研究，以服务分而治之的统治与开发。兼具政治动员力、经济组织力、文化异质性与跨境流动性的华人社群则尤受关注，被视为殖民地人口中“最重要、也最难管理”^[20]的群体之一。在此背景下，殖民官员与学者的知识生产成为统治策略的依据：一方面以武力压制华人势力，另一方面通过制度改造剥离公司、帮会等组织的权力，并将会馆、宗亲会等的功能拆解与窄化，使之萎缩在互助或宗教团体范围之内。一言以蔽之，核心在于对华人社会与组织进行“去政治化”的改造。

相关记载显示，早在欧洲殖民势力介入之前，南洋已出现华埠、唐人街等华人社区，并形成公司、宗祠、商会等政治、经济与文化组织，甚至建立过若干华人政权。^①但这些政治实践多在殖民扩张中被武力镇压，本身的历史也鲜为人知。以18—19世纪的兰芳公司为例，这一具有独立税收、司法及军事体系的组织，长期以来被西方学界排除在现代“国家”的概念之外。荷兰汉学家高延（J.J.M. de Groot）虽注意到其独特性，但将其解释为源自中国“共和式村社”的原始民主部落联盟。^[21]20世纪中叶后，部分学者转向社会经济分析，又多以功能主义视之为移民适应环境的工具性组织。^[22]两种叙事虽然角度不同，却都倾向于以“前现代自治体”或“经济互助组织”为其定性，背后是西方对“国家”与“文明”定义的垄断，凡不符合现代民族国家标准的政治实践往往被降格为缺乏法理主权的自发联合或前现代遗存。然而，就华侨华人在东南亚的历史经验而言，这些组织并非单纯的民间结社。兰芳虽名为“公司”，实则构建了具有税收、司法、军事功能的准政权体系，^②并尝试借助与清朝的朝贡关系获取合法性；与此相类似，华侨领袖也常以“天朝子民”身份参与本地政权的朝贡体系，如暹罗华人郑信建立吞武里王朝后向清朝请封。

在西方殖民力量的选择性编纂下，这些概念进一步出现了从“政治政权”“经济文化组织”到“自治共同体”再到“非法私会党”的转变：或将“公司”（Kongsi）与会党（Hui）强行纳入“Secret Society”（秘密会社）的译名框架，或将“公司”“宗祠”“宗亲”等中华传统概念统称为“Clan House”，用语言制造认知偏差。而通过制度化的法律规定和舆论宣传，术语混淆之后的华人传统组织逐渐被贴上了“秘密会党”“私会党”乃至“黑社会”“黑帮”的标签；马六甲青云亭、槟城广福宫等被一律视为民俗信仰场所，其作为司法仲裁、社会保障与教育传承的多维功能则被忽视了，共同体的政治属性被消解并简化为文化习俗表征。例如，荷兰汉学家施莱格（Gustave Schlegel）基于天地会和西洋共济会的研究，首先提出了“私会党”这一充满殖民焦虑的学术概念；^[23]其后，荷兰殖民当局在控制东印度群岛时，通过严苛的结社限制法案将华人社团视为“非法组织”。同样，英国殖

^① 例如，梁启超曾从中国传统史料出发研究了在东南亚拓殖的8位华人国王。见梁启超：《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梁启超全集（第五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366~1368页。

^② 这里的“准政权”指包括兰芳公司、戴燕王国以及在泰国、马来半岛等地出现的拥有独立武装、税收和司法权的华人政治实体。

民者也在海峡殖民地利用媒体大肆宣传秘密会党的危险性，强化华人社团的负面形象。^[24] 值得反思的是，这种源自殖民治理的分类学甚至渗透到了后世的中文学术研究中。部分研究在现代化叙事的影响下，也曾批判东南亚华人社团为“落后的封建宗法组织”。这种视角的延续体现出殖民话语霸权的深远影响，成功掩盖了华人组织曾发挥的积极治理功能，为欧洲殖民者的“无主地”（terra nullius）原则提供了证据。

借助上述污名化表述，19世纪契约劳工这一特定历史情境下的移民形态在西方学术话语中被泛化为华人移民史的总体特征。随着殖民者的进入，南洋原有的政治经济文化格局被重塑，区域贸易网络逐步纳入殖民经济结构，华商与华人移民虽成为殖民经济与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却失去了作为地方贸易主体与社会参与者的传统位置。特别是16世纪以来，英、荷、法等国为满足开采农矿资源与经营商业贸易的需求，将劳动力组织与供应置于其统治核心；而地广人稀、生产力有限的南洋无法提供足够劳力与技术，殖民者遂转向外部招募，大量契约华工作为廉价劳动力进入东南亚，移民方式也由自愿“出洋谋生”“避难”转向苦力贸易、赎单苦力与“猪仔”贩运。^[25] 作为殖民经济工具的华人劳工被制度化地标定为“外来者”，并被排除在地方政治权力之外。此种心态在殖民官员的论述中表现得尤为露骨。英国殖民官员瑞天咸（Frank Swettenham）曾傲慢地宣称，“如果没有英国官员维持秩序和公正，成千上万的华人根本不会进入这个国家；如果没有英国对税收的管控，就不会有资金用于修建公路、铁路及其他各类发展工程；如果缺乏远见卓识和精明的管理，即使有资金可用，规模也会小得多，甚至可能被浪费。”^[26] 这种论调将华人的存在完全置于殖民秩序的恩赐之下，视其为需要被管理和规训的经济从属者。即便是拥有一定经济与政治实力的土生华人，也往往只能在殖民体系的夹缝中充当中间人角色。

需要注意的是，西方殖民力量一方面将东南亚华侨华人视为连接欧洲与东南亚贸易网络的重要媒介而不得不依赖其在经济社会活动中的关键作用；另一方面，华人群体的经济独立性和人数增长又令殖民者深恐华人尾大不掉而难以控制。^[27] 这一双重心理导致殖民政权对华侨华人采取了矛盾交织的政策：招徕又限制、依靠又打压、利用又屠杀，这是由殖民政权的性质决定的。以荷兰殖民者为例，17世纪初占领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后，他们一方面设立华人甲必丹制度，通过授予华人领袖有限的自治权来招揽移民、繁荣巴达维亚的贸易；另一方面，当华人势力发展到令当局感到不安时，便不惜通过限制性立法甚至制造惨案来进行暴力规训。^[28] 同样的治理逻辑也见于英国海峡殖民地，英殖民政府早期在槟城等地极力推行自由贸易以吸引华商，而在后期则通过一系列土地法案与社团管制条例，试图遏制华人资本的土地兼并与政治影响力的扩张。但殖民政权对华人的复杂态度也令人沉思：倘若华人仅是依附性的边缘者，殖民当局何需倚重其力以行间接统治？这种“既用且防”的矛盾心态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早期华人社会绝非原子化的散沙，而是早已在东南亚构建了一定的社会根基与严密网络。正是这股独立于西方之外的内生力量，迫使殖民者不得不长期在依赖与遏制之间维系平衡。

（三）建构体系：西方中心论

无论是以西方开埠为起点的历史论述，还是关于西方开发经营东南亚的叙事，实际上都是以“西方中心论”为内核所构建的殖民现代性知识秩序。这一研究框架在视角上始终以西方为历史叙事的主体，强调西方作为历史进步和变革的推动力量；在形式上以所谓“科学化”“规范化”的史料与理论建构，将西方历史叙事包装为历史正统；在内容上以西方殖民扩张及制度影响作为东南亚历史的主线与解释框架。因此，所谓的“西方开埠”与“经营开发”并非单纯的经济或政治事件，而是权力与话语相互作用的产物，是一种权力的延伸与再生产，背后凸显的是全球历史叙事中所长久存在的结构性偏见。

以“文明开化”为名、行“认知殖民”之实的西方中心论研究框架是在西式认知霸权的运作下逐步形成的。从表面看，殖民当局以现代档案管理为名，通过档案制度的选择性记忆构建认识论基

础，将华人会馆碑铭、贸易账册、侨批文书等民间史料排除在官方档案体系之外，转而制造大量聚焦苦力贸易、契约管理的殖民文书。如英国东印度公司档案将槟城华人甲必丹制度描绘为殖民行政体系的附属物，淡化其源于明代海商自治传统的社会治理经验。而在借助学术规范的合法性包装下，殖民时期编纂的《海峡殖民地档案》系列、《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台湾长官致巴达维亚总督书信集》等文献则获得了“客观史料”的学术地位。借助这样一整套以法律、学术规范、语言、制度等“标准形式”收集裁剪而形成的史料系统，进而掩盖早在殖民者到来之前的东南亚社会发展事实、掩盖华人在此长期耕耘开拓的历史贡献、掩盖殖民者的劫掠性的历史角色。长此以往，本来是作为东南亚社会“先驱者”和“开拓者”的华侨华人被矮化为殖民者到达之后的“外来移民”“逃难者”，本来已经构建起自身文明体系的东南亚社会被误解为“蛮荒烟瘴之地”，本来已经发展起来的华人商贸网络被建构为“非正式经济”、各种组织被贬为“前现代残余”，西方开埠前已存在数百年的华人定居点被重新阐释为殖民开发的产物。

西方中心论体系的当代延伸仍体现为学术话语的继续控制。随着东南亚华侨华人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发展被置于次要和附属地位，华侨华人成为脱离“母国”本位、游离于东南亚本土社会的“他者”，西方继续通过社会制度、教育、媒体、宗教信仰等话语灌输方式一代又一代地规训着东南亚民众接受西式新秩序，实现范式固化。而这也导致接受西方教育体系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学者，很难真正跳出西方话语框架的限制来全面反思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知识结构与价值体系，使本土研究者陷入认知失语的困境。

三、作为“自主”的华人：东南亚华侨华人自身的视角

当前，言必谈 16 世纪尤其是 19 世纪之后的欧洲殖民势力对东南亚的巨大影响、使其嵌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似乎已然成为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的论述起点。然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换一个角度观察便会发现，此类论述只能说是短时段的历史而非长时段的历史：第一，把殖民贸易预设为东南亚融入全球网络的起点，忽视了前殖民时期延续千年的跨文明交往；第二，以欧洲为中心的线性叙事削弱了本土社会能动性，将区域发展简化为西方现代性扩张的附庸。事实上，“西方开埠”既非凭空出现，也不是东南亚走向现代的唯一起点，只是世界史上诸多转折之一。殖民者东来之前，华人已在马来亚等地从事开发与贸易，在南洋各地生根发芽、开枝散叶。那么，研究东南亚就不能忽视本土社会在历史进程中的自主能动性和内生逻辑，不能忽视早期华人群体作为区域开拓者和经济文化建设主体的关键作用，不能忽视在西方贸易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历经数个世纪发展而形成的政治、贸易、经营与组织等传统。

根据中国史籍所载，最早在汉代就已有中国与南洋各地交往的文献记录，因各种原因而流寓南洋的华人开始定居于此；唐朝时期已有不少中国商人在东南亚各地展开贸易活动并在当地定居，^[29]“唐人”“唐山”“唐人街”等惯称也基本于此时形成。唐代“黑石号”沉船出水的 6 万余件中国瓷器也证实了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宋元至明清时期，中国移居东南亚的人数进一步增多，并从流寓转变为定居、从零散寓居到聚居成村，还有一些形成了华人社区。《真腊风土记》《诸蕃志》《岛夷志略》等文献中均记载了当时广泛分布于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亚和暹罗等南洋各地的中国移民，且华人定居点和社区内已经出现了移民的新老之分。而根据西方资料所载，14—18 世纪时已有许多中国商人在占婆、柬埔寨、爪哇和苏门答腊等东南亚港口定居，并与当地妇女结婚，其子从事贸易。^[30]这种内生性经济网络与荷兰东印度公司档案中记录的 17 世纪巴达维亚华人甲必丹制度是可以互证的，即殖民时期的“间接统治”策略实为对既有华人治理传统的制度性征用。由此可以确定的是，自唐宋以来华人便以贸易、移民和文化交流的方式参与到东南亚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他们一方面与中国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另一方面也开始逐步与南洋本地人相互融合同化，甚至还出现了因流寓当地而被南洋诸国统治者所任命的华人使节。^[31]在此过程中，早期东南亚华人社会逐步在

南海诸国形成，其中既有以华商为主体的“土生华人”，也有以贫苦百姓为主体的华侨社会雏形。^[32]随着华商企业规模和华人移民群体的扩大，华侨华人在南洋开始了组织严密的集体经营。^[33]而由于中国封建王朝奉行“天朝上国”理念，对于流寓海外的华侨普遍采取“海外弃民”的态度而不事管理，且东南亚诸国政府与中国大体上保持友好关系，故而华侨华人与东南亚土著民族之间也建立了较为和平的共存关系，都以各自的方式对东南亚社会的早期拓荒与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

此外，华侨华人的社会基础并非完全依赖外部强权，而是在东南亚通过贸易、劳动与社区建设长期积累而成，并形成了具适应性的社会嵌入方式；虽未必彻底融入主流社会，却足以维持一定自主性与稳定性，并与南洋各族先民共同推动区域历史发展。因此，殖民者的到来并非单向征服，而是对既有社会关系与权力结构的利用、改造与整合。从长时段视野来看，民族国家只是近代现象，关键在于人的组织：华侨华人早已构建寺庙祠宇等血缘、地缘、业缘网络，并在不同时期发展为互助性的政治、经济、文化社团。殖民时期在缺乏制度保护下，他们更倚重宗族、行帮与地域社团，在夹缝中维系文化延续与社会独立，并进一步演化出跨地域、跨帮派与跨血缘的宗乡会馆、宗亲会、同业公会与商会等组织。

以上种种都说明，区域社会的组织与发展能力早在殖民时代前已有所发展，而非“无组织的东南亚”在等待西方启蒙。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的学术转向已显现突破殖民现代性范式的可能路径。美国汉学家孔飞力（Philip Kuhn）以500年全球移民史为框架，系统梳理华人自16世纪至当代的跨国迁徙历程，将历史的主体性从“殖民者”回归到了华人自身的社会生态之中。^[34]澳大利亚历史学家瑞德（Anthony Reid）的“贸易时代”研究，揭示了东南亚在前殖民时期已形成复杂的市场网络与货币体系；^[35]王赓武的“海洋中国论”突破陆权中心观，尝试重新定位华人移民在环南海经济圈中的历史坐标；^[36]滨下武志的“朝贡体系”研究则论述了东亚区域秩序具有不同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另类现代性。^[37]这些成果为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启示，特别是随着区域国别学的建立和华侨华人学科建设的呼吁，已有学者逐步认识到早期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视角性的局限。例如，中国侨史研究巨擘周南京提出，应从海外华人社会本身的变化来研究华人问题；^[38]吴小安认为，整个东南亚研究应该承认东南亚华人根深蒂固的历史作用；^[39]王琛发也提出，研究南洋华人历史文化，绝不能忽略唐宋元明以来南海诸国早已存在的各自地方上的华人社会，从而提出不同于西方殖民社会主流认知的历史叙述及话语系统。^[40]可以说，重新思考近现代以来的西方中心论体系、构建以东南亚华侨华人自身为主体并兼具本土视角与全球视野的学术范式的时代已经到来。

四、从“他者”到“自主”：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体系的“三个”重构

东南亚华侨华人的历史植根于区域内长期积累的内生社会网络、经济活动和文化互动之中。笔者认为，当前需要超越以“西方殖民者为中心”的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学术体系，从华侨华人自身在东南亚的社会历史事实出发，以“华侨华人中心”重新构建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的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

（一）走出被掩盖、被误解的历史，重构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的史料体系

史料体系是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的基石，但历史记忆的选择与权力对史料保存的操控往往使历史本体与史料呈现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如前文所述，西方殖民者通过知识生产与文献材料，系统性地注入了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与殖民者凝视视角，影响了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史料的收集、整理与解读方式。

殖民时期的史料机制大致有三点特征：一是档案记录主体以殖民官员、传教士和商人等为主，记录视角多是文明等级论的认知框架。二是内容筛选服务于殖民治理。如被誉为“任何想要研究远东事务和东南亚事务的研究者案头必备书籍”的《马来亚华人秘密会党史》一书，系统性地将华人

各种社会组织归类为地下非法组织或黑社会团体，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华人在南洋的合法存在。^[41]但早期华人自身的史料，如家族谱牒、宗祠文书、商业账册以及口述传说等，因缺乏话语权而未能被纳入主流历史叙事。三是史料阐释的意识形态预设。如被誉为东南亚华人问题第一代权威学者的马来亚殖民政府高官巴素曾著《马来亚的华人》（1948年），书中基于英方立场将华人外来移民视为“二等公民”。^[42]这些著作虽客观上保存了大量关于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珍贵记录，但立场深植于殖民权力，难免带有殖民治理需求与主观利益，因而只能呈现历史的一面，不能作为唯一准绳。研究者对此必须保持清醒的批判意识与警惕。

因此，重建更真实立体的历史，需要多元互证的史料体系。从形式上看，既包括英国殖民部和外交部、荷兰东印度公司等西方殖民政权中涉及东方事务的历史档案，未刊清档和民国档案中的涉侨资料，东南亚诸国本地的相关政府档案、报刊，官方组织编写的史书和成文的历史著述、回忆录和被喻为“历史的第一份草稿”的公开报道等官方档案；也包括东南亚华侨华人谱牒文献、碑刻、墓志、契约、账簿、私人来往书信和其他文字记述等民间史料；还有通过对老一辈华侨华人及其后代访谈所获得的口述史料。从载体上看，既有文献史料；也有华侨华人在东南亚各地遗留的华人庙宇、会馆、商铺等建筑、工具、装饰品、日常用品等各种实物史料和图像资料等；还可以将当今遗留的民间信仰仪式等民俗学资料作为讨论历史现象的依据。但问题在于，这些原始资料多散见于各国图书馆、档案馆、政府档案与华人社区的会馆、宗亲会等处，一方面需要研究者综合运用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方法，在东南亚当地进行长时间的田野调查与资料搜集，探访华侨华人后裔、各种祠堂会馆等；另一方面也需要研究者从东南亚发展的长时段、多角度的整体史观出发，认证考订、鉴别所收集史料文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去“伪”存“真”，既不夸大华侨华人在东南亚社会中的早期贡献，更不能落入西方中心论的学术体系之窠臼，而是要从真实史料出发审视华侨华人在东南亚社会中的历史定位，重新书写华侨华人在东南亚的真实历史。

（二）打破西方中心论垄断与霸权，重构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的话语体系

话语体系不仅是语言的表述，更是历史解释权的集中体现，深刻反映着特定时期的文明观念与权力结构。近代西方现代性的扩张使以西方经验为摹本的知识范式占据主导，经常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或“殖民化”。在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中，这种西方中心视角的结构性的偏见主要体现在：以后来的殖民治理为坐标，低估殖民者东来之前华人长期的在地积累；以西方法政概念硬套华人组织形态，致使“公司”“宗祠”等自治机制被误读乃至污名化；将华侨华人的作用功能化为经济中介，忽视其政治参与、文化建设与社会治理的能动性。这种认知偏差导致华侨华人在历史叙事中面临着“双重边缘化”的困境：在西方殖民史观中，他们是依附于殖民经济的工具性存在；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排他性话语中，他们又易被异化为永远的外来者。因此，当前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亟须进行一场认识论层面的反思，从而立足本土实践，构建一套能够真实反映华侨华人历史主体性与复杂性的学术话语体系。

打破西方中心论的垄断与霸权，以东南亚当地的脉络和立场、以华侨华人本身的内在自主历史为出发点来讲述南洋华人的历史、文化、世界观和价值观，重新建立东南亚华人研究的话语体系是关键。一是从东南亚华侨华人发展的现实逻辑出发，重新书写华侨华人在东南亚的历史。根据相关历史文献记载，早在西方人到来之前，华人社会就已经在南洋各地生根发芽、开枝散叶，他们不仅在南洋社会的早期开疆拓土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而且在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中做出了巨大贡献。二是立足于东南亚华侨华人的自身视角和经验，打造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长期以来，受制于“冲击—反应”模式的认知惯性，西方学术话语往往倾向于将东南亚华侨华人视为被动卷入现代化的外来移民，或仅视作殖民经济的附属品。这种视角的局限性导致了华人社会组织形态的长期误读。未来的研究应坚持从东南亚华侨华人自身的文化脉络与生存实践出发，对核心概念进行去污名化的重构。比如，需要挖掘“公司”“会馆”在当时历史情境下的真实政治经

济功能，这不仅是为先人正名，更是为了提炼出具有解释力的本土化概念。三是推动从话语生产到话语权力的逻辑转变，争取制度性话语权。打破西方中心论的垄断，不应止步于单方面的批判，而应通过扎实的实证研究与理论建构，确立一套在逻辑上更严密、在解释上更具包容性的新范式。这要求在实践中不仅要讲好华侨华人的故事，更要争取这种基于本土经验的叙事方式在国际学术界获得制度性的认可。

（三）立足于东南亚华侨华人自身，重构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的理论体系

理论体系不仅是知识与史料体系的集合，更是话语体系的思想基础和逻辑框架，从中可以体现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的成熟度和系统性。不可否认，诸如依附论、同化论与跨国主义等源自西方的理论范式，曾为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工具，但当这些理论被不加批判地普遍化时，其解释力的局限性便日益显现：依附论往往侧重于经济结构的依附关系，容易将华人简化为殖民体系或全球资本的被动代理人；同化论常预设一种从异质走向融合的单向线性演进，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族群文化的韧性与多元共生的可能；跨国主义虽然打破了国家界限，却有时因过度强调流动的流散特征而相对忽视了华人在地深耕的本土化努力。更何况，最初专指犹太人大“离散”（Diaspora）的这个词汇是否适用于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仍有待商榷。^[43]面对这些理论，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迫切需要一种视角的转换与理论的自觉。这种自觉并非要完全摒弃既有的西方理论，而是主张不能仅将东南亚华侨华人视为验证西方理论的案例或注脚，而应将其视为产生知识的“主体”。

如前所述，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应首先在理论层面确立“以东南亚华侨华人自身为中心”的视角。无论是来自中国的海外贸易还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都应当只是东南亚华侨华人在此生长、发展的一个线索，而其本身的历史是各种人和事相互联系的有机体。具体而言，应从华侨华人在东南亚社会内部的发展进程出发，避免将东南亚华侨华人社会的历史简单视为中国或西方历史的延续，也不将其封闭于狭隘的界限范围内；而是以华侨华人社会为中心，探索其在不同社会历史背景下的复杂互动过程，包括他们的社会组织、文化实践、经济活动以及与南洋和中国社会的互动关系等，以“由内而外”的研究方法构建起一个更为立体和动态的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理论框架。另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在方法论上构建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的理论体系，全面重新书写华侨华人的历史、发展、组织及互动关系等。笔者认为，应在“大历史观”和“大时代观”相结合的宏观视野下客观剖析史料，追溯从朝贡体系到世界体系的转型中华侨华人从迁徙、定居到参与东南亚国家建设的整个过程，构建出华侨华人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图景并体现其历史发展的延续性。由此，在以东南亚地区内在历史与华侨华人发展的立场与框架之下，综合考虑中华文明的影响和殖民体系的冲击，重新构建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的理论体系。

五、结语

每一代的学者都有其时代使命，每一代的学术都有其时代意识，每一代的学界都有其时代主题，故一时代自有一时代之学术。千百年来，东南亚华侨华人群体一直在历史与现实不断探寻自身、重新定位自身与世界的关系。当前，随着西方中心论普遍遭到质疑，全球学术界正面临着新的挑战与转型，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破解西方中心论、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已经到来。而构建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的史料体系、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不仅需要中国学者的努力，也需要海外学者的共同参与，从而形成一个紧密合作的学术共同体，共同为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整理新史料、贡献新理论与新方法。这不仅为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学术范式的转型，更是其自身推动叙事去殖民化、重新定义历史与社会角色、重建文化自信与话语权利的关键实践。但范式的转型与历史的重写总是充满阵痛的，笔者只是在重构东南亚华侨华人知识体系的道路上做出一些框架性思考，期望能抛砖引玉，激发更多学者在跨学科视野下继续进行深度挖掘与批判性反思。

[注释]

- [1] 庄国土主编:《世界华侨华人史》,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8 年, 第 402 页。
- [2] Wang Gungwu, “Sojourning: The Chinese Experience in Southeast Asia”, in A. Reid ed., *Sojourners and Settlers: Histories of Southeast Asia and the Chinese*, St Leonards, NSW: Allen & Unwin, 1996, pp.1-14.
- [3] Wang Gungwu, *Community and Nation: Essays o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Chinese*, Singapore: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Asia) Ltd., 1981.
- [4] 陈育崧:《椰阴馆文存》(第 1 卷), 新加坡: 南洋学会, 1983 年。
- [5] 廖建裕:《东南亚与华人族群研究》, 新加坡: 新加坡青年书局, 2008 年。
- [6] Ien Ang, *On Not Speaking Chinese: Living Between Asia and the West*,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 [7] 梁志明:《古代东南亚历史与文化研究》, 北京: 昆仑出版社, 2006 年, 第 2-7 页。
- [8] 李国梁:《两个三十年: 感受华侨华人研究的变化》,《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9 年第 4 期。
- [9] 林云、曾少聪:《族群认同: 菲律宾华人认同的变迁》,《当代亚太》2006 年第 6 期。
- [10] 刘宏:《跨国华人: 实证分析与理论思考》,《二十一世纪》2002 年第 71 期。
- [11] 李明欢:《逐梦留根: 21 世纪以来中国人跨国流动新常态》,《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3 年第 3 期。
-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9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1 年, 第 149 页。
- [13] 李恩涵:《东南亚华人史》,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5 年, 第 1 页。
- [14] Sir Thomas Stamford Raffles, *The History of Java*, Volume 2, London: John Murray, 1830, pp.69-146.
- [15] Jan Willem Cornelis Cordes, *De privaatrechtelijke toestand der vreemde Oosterlingen op Java en Madoera*, Leiden: S. C. van Doesburgh, 1887.
- [16] Leonard Blussé, *Strange Company: Chinese Settlers, Mestizo Women and the Dutch in VOC Batavia*, Leiden: KITLV Press, 1986, pp.73-96.
- [17] Wilfred Blythe, *The Impact of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sia: A Historical Stud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1.
- [18] [英] 尼古拉斯·塔林主编, 贺圣达等译:《剑桥东南亚史》(第 1 卷),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第 286-291 页。
- [19] 巫乐华:《南洋华侨史话》,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年, 第 7 页。
- [20] Charles John Canning,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Transfer of the Control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from the India Office to the Colonial Department*, London: Harrison and Sons, 1858-1866, p.13.
- [21] [荷] 高延著, 袁冰凌译:《婆罗洲华人公司制度》, 台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6 年, 第 70、116 页。
- [22] Mary F. Somers Heidhues, *Goldiggers, Farmers, and Traders in the “Chinese Districts” of West Kalimantan, Indonesia*, Ithaca, NY: SEAP Publications, 2003.
- [23] Gustaaf Schlegel, *Thian Ti Hwui: The Hung-league, Or Heaven-earth-league, a Secret Society with the Chinese in China and India*, Batavia: Lange & Company, 1866.
- [24] William Alexander Pickering,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and their origin”, *Journal of the Straits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No.1, 1878, pp.63-84.
- [25] 周鸽:《19 世纪南洋开发与华人海外移民》,《闽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1 年第 4 期。
- [26] Sir Frank Athelstane Swettenham, *British Malaya: An Account of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British Influence in Malaya*, London and New York: J. Lane, 1906, p.301.
- [27] 吴凤斌:《东南亚华侨通史》,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第 54 页。
- [28] 何美兰、威文恺:《19 世纪爪哇的华人甲必丹制度初探》,《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3 期。
- [29] 梁英明:《东南亚史》,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0 年, 第 169 页。
- [30] James D. Tracy, *The Rise of Merchant Empires: Long Distance Trade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1350-1750*,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31] 张国刚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4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555-576页。
- [32] 方金英:《东南亚“华人问题”的形成与发展: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案例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年,第10页。
- [33] Anthony Reid, *The Chinese Diaspora in the Pacific*, London: Routledge, 2008, pp.69-110.
- [34] [美]孔飞力著,李明欢译:《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
- [35] [澳]安东尼·瑞德著,吴小安、孙来臣、李塔娜译:《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年》,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 [36] 王赓武:《南海贸易——对南中国海中国早期贸易史的研究》,姚楠编译:《南海贸易与南洋华人》,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8年。
- [37] Takeshi Hamashita, *China, East Asia and the Global Economy: Region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London: Routledge, 2013.
- [38] 周南京主编:《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总论卷)》,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第3页。
- [39] 吴小安:《华侨华人学科建设的反思:东南亚历史研究的视角与经验》,《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
- [40] 王琛发:《17—19世纪南海华人社会与南洋的开拓——华人南洋开拓史另类视角的解读》,《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 [41] Wilfred Blythe, *The Impact of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 A Historical Stud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 [43] Victor Purcell, *The Chinese in Malay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8.
- [43] 张继焦:《“Diaspora”一词不适合用于东南亚华人研究》,在“国际华人暨侨乡研究之理论、范式与方法论”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2024年6月28日。

[责任编辑:胡修雷]

· 书讯 ·

《广西玉林华侨华人史》出版

由广西民族大学郑一省教授所著的《广西玉林华侨华人史》一书于2025年8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利用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资料,分析玉林人前往海外的移民背景及阶段、玉林籍华侨人口的变化、其在海外的分布、经济与教育文化的历史与现状。该书还对玉林地区侨务演变等问题得出一些新观点,拓展和深化了广西地区华人史的研究。